

数智赋能：课程思政协同育人伙伴关系的构建进路

路涵旭

(南开大学, 天津 300350)

摘要:课程思政提出的底层逻辑是为了实现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协同育人。数智技术为课程思政教师与思政课程教师协作搭建桥梁,推动课程思政协同育人伙伴关系的构建以实现协同效应。数智赋能在消弭协同育人时空阻隔、消解协同育人协商逆差、破解协同育人发展难题上提供动力支撑;在重构课程思政的育人生态、重组课程思政优质资源、重塑课程思政的协同格局上彰显出独特优势。数智技术的运用也存在数智空间遮蔽主体创新、工具理性支配价值理性、技术逻辑背离协同育人的现实问题。面对课程思政伙伴关系构建危与机并存的现实,需要从国家的顶层设计、学校的配套服务和教师的实践执行等三个方面着力,以建立教师紧密协作的伙伴关系。

关键词:数智赋能;课程思政;思政课程;协同育人;伙伴关系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2614(2025)05-0055-06

DOI:10.19903/j.cnki.cn23-1074/g.2025.05.01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数字化+智能化”的飞速发展和深度融合,推进了“数字化”向“数智化”的跃升,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共同作用下,人类社会进入“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1]的数智时代。深刻把握数智时代的脉搏,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2]战略。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 2024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的主旨演讲中强调,“更智能化发展数字技术,服务人的全面发展”,通过“实施人工智能赋能行动,促进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AI for education)”^[3]深度融合。数字化、智能化正交织成为促进教育变革新引擎。“高等教育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研究主体和应用领域,相较于其他教育阶段,将最先迎来数智化转型的机遇”^[4]。立足数智技术与高等教育快速融合的时代背景,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作为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落实的战略举措,要抓住时代赋予的历史机遇和发展契机,推进课程思政数智化转型,以数智技术为课程思政建设赋能,实现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

以数智技术为课程思政建设赋能,是数智时代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的重要突破口。那么数智技术如何为课程思政建设赋能?这需要回到“课程思政”提出的原点。自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5]起,

“课程思政”的出场便与思政课程紧密相连。课程思政建设必须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协同育人,发挥育人合力以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教育任务。那么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如何实现协同育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课程体系,解决好各类课程和思政课相互配合的问题,鼓励教学名师到思政课堂上讲课。”^[6]在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中,教师是关键,要紧紧抓住教师队伍“主力军”,“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作用,切实提高每一位教师参与课程思政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7]。由于育人的主体是教师,课程协同育人通过教师协同育人实现,而各课程教师的差异化又使协同育人需要建立稳定持久、常态化互动的关系来维系。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人作为具体的、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不可避免地要与他人形成各种各样的关系。推进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就是要推进课程思政教师和思政课程教师结成步调一致的伙伴关系。由于时空局限与课程差异,课程思政教师与思政课程教师的“步调不一、合力不强”^[9],协同育人发生“变形”或是“各自为营”。基于数智技术具有的互联互通、精准匹配、高效凑约、灵活便捷等功能形成的“关系纽带”,推动课程思政教师与思政课程教师建立协同育人伙伴关系,成为实现协同效应的“最大增量”。换句话说,数智赋能课程思政协同育人伙伴关系构建,成为数智赋能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的“关键一招”。

收稿日期:2024-09-10

基金项目:2021 年度天津市教委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高校专业教师与思政教师协同育人模式研究”(编号:2021YJSB074)。

作者简介:路涵旭,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课程思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二、数智赋能构建协同育人伙伴关系的动力之源

数智技术发展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转变与革新的旷野,为构建课程思政协同育人伙伴关系提供动力支撑。推进课程思政协同育人伙伴关系构建,就“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10]。在推进教师互动交流上,不能只限于会议和培训等集体活动,还应该触及教师个体间的社交活动,将数智技术嵌入教师协同育人系统,打造跨时空的教师互联互通、协商协作的数智网络平台,以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技术支撑赋能课程思政教师与思政课教师结成良好的互助伙伴关系,从而为真正实现协同育人添薪续力。

1. 网络化联通:消弭时空阻隔

一是互动即时性。数智化媒介是流动、活跃、异质的行动者网络构成的动态联通体,为教师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开放对话与情感共鸣的协作场。这种互动性数智媒介能紧随教师发出的互动问题,快速网罗问题相关数据信息进行智能化分析、解答,并为不同教师就同一问题进行深入研讨架起互动桥梁,有效应对时间冲突引发的交流难问题,以互动即时性提升教师交流学习积极性,为教师协同育人提供便捷高效的互动平台。

二是空间无局限。空间局限主要指地域的距离限制,教师因受到所在地的限制,无法随时参与或组织开展互动交流,而数智化媒介可以跨越物理空间距离,大大降低教师参与难度。教师间随时随地“面对面”的视频、语音通信,开拓了教师交流协作的交互性新通道,以最大限度提升教师协同合作的体验感,增强合作黏性。

2. 信息化沟通:消解协商壁垒

一是破除跨学科对话障碍。不同课程教师借助于数智化互动平台结成育人“伙伴”,促进“他者”与“我”产生育人互动与联动,消解“隔行如隔山”的交流障碍。数智技术驱动着媒介信息内容与教师需求精准对接,对于因学科壁垒而产生的专业术语的理解障碍,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综合施效以其特有的即时“翻译”功能,可将不同专业知识予以解码,并能智慧地破解信息传递中隐藏的“密码”,在完成信息数据的收集、分析后,进行重新编码传递出去,有效消解教师在协商中的跨学科对话障碍。

二是改变教师间的“话语逆差”。在传统课程思政推行中,不同课程教师交流中存在逆差,通常是思政课教师或者优秀示范教师代表的单方面输出,这种单方的“话语流向”只会产生“话语鸿沟”、导致“话语逆差”,使其他教师在“话语场域”中难以自我赋权,而无法实现“平等”对话,无法擦出思想火花。其主要表现为协商交流“顺差方”会以非强制、隐蔽化的方式改变着他人的思维方式,协商交流“逆差方”则会出现“失语”或“跟着说”的现象。数智技术为各课程教师结

成育人伙伴关系提供共商共议的互动平台,以协商凝聚共识建设课程思政的“协作利基市场”。

3. 智能化畅通:破解建设难题

自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来,全国各高校在其指导下推行课程思政已贯通了四年本科学制周期,从各类课程中挖掘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实践成为教师的普遍共识,课程思政建设在总体上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课程思政教师胜任力不足、思政元素的“同质化”^[11]和“硬融入”、思政内容呈现“碎片化”“零散化”、课程思政教学流于“形式化”^[12]和“表面化”等问题,使课程思政建设显现发展疲态、陷入发展瓶颈。这启发课程思政建设要由普遍推行向提质增效转变,借助于数智技术匹配思政课程教师与课程思政教师建立育人伙伴关系,使课程思政教师在从“自我摸索”到“交流协作”的转变中不断提升育人能力,进而为课程思政建设开拓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是数智技术赋能教师协作挖掘思政元素。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时,指出要“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13]。同样,课程思政建设也要“深入挖掘各类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14]。课程思政教师与思政课程教师要结成挖掘思政资源的“伙伴”,以数智赋能形成相对稳定的协作结构。教师通过大数据的采集与可视化技术、区块链的分布式节点存储与点对点传输技术、人工智能的精准提取等功能,协作完成从大量的课程资源中提取深藏其中的思政资源,力求内容新颖和有思想深度。思政课程教师与课程思政教师合作完成筛选,既能保证思政元素的深刻性和育人性,又可以促进思政元素有机融入教学内容。

二是数智技术赋能教师协力推进精准思政。教师结成育人伙伴关系不仅是为了协同备课,还贯通课前设计、授课实施、课后改进的全过程。教师协力推进全过程精准思政,避免生硬僵化、流于形式。运用数智技术进行全息动态实时抓取所提供的智能化学情检测和分析,勾画出不同学生的思想困惑与实际需要的“数字画像”,辅助教师课前依照学生所需精准设计课程内容;助力教师课中以精准推送、精准供给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实现课程育人的精准滴灌;帮助教师课后通过学情分析优化和改进育人方案。将数智技术运用于教师协同育人全过程,推动课程思政常规教学的数智化转型。

三、数智赋能构建协同育人伙伴关系的优势表征

1. 拓展空间:重构课程思政的育人生态

随着教育发展进入数智时代,“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为基础,依托各类智能设备及网络,积极开展智慧教育创新研究和示范,推动新技术支持下教育的模式变革和生态重构”^[15],成为教育发展新趋向。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教师协同育人的深度融合,使传统受限的

协作时空为虚实融合的泛在交互式协作场所取代,由数智化驱动的泛在智能,将渗透到教师协同育人的各个场景中,促进课程思政教师与思政课教师结成育人伙伴关系,推动形成数智技术、教师队伍、育人资源与协同场景高度集成的课程思政“新生态”。

一是课程思政育人“新生态”是教师协同育人的组织形式。数智技术的广泛渗透和应用,使育人系统从相对孤立封闭走向开放融合。人工智能的广泛部署和数字网络平台的迭代升级,为教师协同育人架设起互动的拟态场景,使教师可以突破时空束缚和学科限制建立伙伴关系,实现不同学科、课程、教师的全体覆盖和智能协同。这种运用数智技术手段组织架构的育人生态,为教师打造良好的合作环境,使教师具身化、实景化、鲜活化地进行协商、促进协作、达成协同。

二是课程思政育人“新生态”是教师协同育人的创新源泉。数智赋能以科技创新为教师建立伙伴关系打造创新融合空间,成为重构课程思政育人生态的关键要素。课程思政育人生态中不同教师“智能化”互动合作,为知识与思想的碰撞提供契机,可以催生出育人的新形式、新方法、新资源,为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孕育出更多创新成果,焕发“乘数效应”。

三是课程思政育人“新生态”是教师协同育人的价值载体。课程思政育人“新生态”实现了全员、全课程、全过程的系统集成和功能优化,通过提供多样化的技术组织服务,使课程思政教师与思政课程教师结成的育人伙伴关系,以高效协作促进育人价值“变现”。同时,数智技术也成为一种新的价值来源和价值创造方式,在赋能教师协同育人全过程中,以优化资源配置与协调协同结构,形成新的育人增长点。由此可见,课程思政新生态已成为育人价值实现的重要载体。

2. 技术赋能:重组课程思政优质资源

一是数智技术赋能使各学科优势资源融合创新。各学科专业的特殊性使其育人资源呈现多样化,数智技术可以将多学科丰富的资源整合成学科交叉的“资源库”,改写以往分门别类整理的“疏离感”,促进各学科优质育人资源在全课程间流动汇聚。基于区块链的“背书”记账、大数据的分析筛选、智能算法的精准投送等技术,重新梳理、组合不同学科的课程育人资源,形成智能化的分配,推动跨学科融合的多维度、多取向发展,通过多学科交互、联动的资源互通共享,实现优质育人资源重组、共享与创新。

二是数智技术赋能各课程优质资源的同质整合。云计算对大数据的挖掘和整理激发了数据的潜能,深度学习使数据增殖具有无限的智慧。数智技术汇聚的丰富优质资源,通过智能化数据挖掘、分析与运用,对相同课程或相关课程的育人资源进行整合,建立同质“资源库”,方便教师学习参照丰富课程案例,进行融会贯通与查缺补漏,同时也需要教师依据课程实际有选择地借鉴采纳,而避免课程雷同,不断开

拓创新。

三是数智技术赋能各教师精准获取育人资源。各课程教师对于丰富的育人资源,不是“照单全收”,而是要精准提取使之“溶盐于汤”。“溶盐于汤”是“溶盐于水”的进阶版,不但要求育人资源与课程内容相融合,还要“咸淡”适宜、营养丰富。教师不但要借助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智技术,获取丰富的育人形式和内容,通过不断丰富教学案例和变换教学形式,提升学生兴趣,拓宽学生视野,还要通过大数据智能化分析,深入了解学生的兴趣、需求和困惑,从而精准提取所需资源“对症下药”,即“能够发挥技术的独特优势,让教育教学从大规模标准化转向个性化、智能化,让每一名学生拥有适合自己的教育方案,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16]。

3. 互补生成:重塑课程思政的协同格局

以互动结成育人伙伴,以互补重塑育人格局。数智赋能教师协同育人,为教师提供“无障碍互动”的技术支持,打通各课程教师的学科身份区隔,使单一的育人效用逐渐被技术力量充盈,技术成为实现教师协同最为重要的路径,从而推进课程思政教师与思政课程教师“互通有无”,形成“互补生成力”,以重塑协同格局推动形成协同效应。

一是组织简化推进协同育人。数智技术塑造的去孤立化、扁平化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弱化了各课程教师的边界感,提升了教师互动的自由灵活度。教师个体为了共同的任务而搭伙结伴建立伙伴关系,不仅不靠传统的层级控制,而且通过密集的多边联系结成交互式的伙伴关系来完成共同追求的目标。“消失的中介”降低了组织管理成本开支,让组织管理效率最大化,促进了协同效益产生。

二是数智转型促进高效协同。数智转型下的教师协同育人,可以跨时空、跨学科实现“无障碍互动”,这大大降低了教师的意志损耗,从而提升其协同育人的积极性。另外,教师们利用数智技术合力深入挖掘专业课思政元素,这大大降低了课程内容不佳、教师经验不足导致的育人风险。抓住数智转型带来的技术红利促进高效协同,提高育人精度,拓展育人广度,深耕育人深度,提升育人高度。

三是深度融合实现协同效应。课程思政教师与思政课程教师互动是育才与育人的张力聚合,借助于数智技术建立教师协同育人伙伴关系,使教师将技术运用与协同场景深度融合,通过与“他者”互动实现优势互补,不仅可以帮助教师补齐短板,还能放大不同优势,以实现协同效应。总之,推动课程思政建设从多课程的普遍推行向各课程提质增效转变,从数量到质量,是追求规模实施向追求协同效益的转变,从而促进育人成果的增殖。

四、数智赋能构建协同育人伙伴关系的现实审思

数智技术为各课程教师搭建的跨时空泛在式育人交流平台,为教师结成协同育人伙伴、建立伙伴关系提供了技术

支持。无论数智技术如何自我创新和释放活力,“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数字化生存也不例外”^[17],因此必须审慎防范数智技术嵌入教师协同育人的潜在风险。

1. 数智空间遮蔽主体创新的发展隐患

数智技术的创造性开发和突破性进展是人类创新精神的彰显与发扬,但如果过度依赖技术则会削弱育人主体的创新意识。英国信息伦理学家卢恰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曾提出一个预见,认为我们下一阶段的未来世界将实现“现实世界”与“在线世界”完全相融交叠,形成一个共通的信息圈(The Infosphere)^[18]。如今这一预设已逐步成为现实,数字技术“穿针引线”缝合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间隙,形成虚实结合的数智空间,延伸了教师的运展限度,为教师沉浸式、具身化地进行育人准备工作提供平台。这一依靠技术革新所构造的数智空间,既启发着人的创造,也会引发人的退化。

事实上,人独有的创造力和感知力是数智技术所不能取代的。“只有人的活动才能称为真正的创造,因为只有人才可以通过学习、观察、总结等创造性的活动发明出原本并不存在的物体”^[19]。“数字时代的境况和氛围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让人上瘾”^[20]，“数字致瘾”的背后是主体创新的丧失和虚无。因为数智技术在为教师备课提供拓展化服务的同时,也大大便捷了教师利用技术替代自己备课。教师无须自己学习思考,就能利用技术智能化生成课程思政的内容,提交出一份较为完备的教案,这种脱离自我学习基础上的“机器学习”形成的“剧本”,限制了主体创新的多种可能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如果他想用唯一的一个剧本为自己铺设一条通向舞台的道路……他应当把自己的剧本建筑在创新的基础上”^[21],否则就会陷入主体创新殆尽的泥沼。教师创新力的削弱与丧失,使教师即便结成育人伙伴关系,也无法发挥育人合力。

2. 工具理性支配价值理性的关系错位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最早提出了人的行为“合理性”概念,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合一,但二者的和谐统一因受到科学主义的冲击而失衡。在教育领域,“教育技术的发展也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断裂问题,表现为技术思维的僭越、人性发展的圈囿和情感沟通的缺失等”^[22]。数智技术的限度问题就是要把握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与平衡,但由于工具理性的“越轨”,技术服务于人也成为“水中月、镜中花”,人成为受技术控制的“傀儡”,从而导致工具理性支配价值理性、技术支配人的关系危机。正如赫伯特·马尔库塞所言:“技术的解放力量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迫使人也工具化,导致人的片面发展,成为单向度的人。”^[23]

随着数智技术作为赋能工具的加快发展,存在价值理性受制于工具理性的错位风险。一方面,由于数智技术的发展

进化,机器自主习得的算法程序不受人设定,而使技术产品自主性不断加强,工具理性在大数据支持下进行深度学习而生成和强化。数智技术难以成为中性的工具,它必然具有某种价值属性,无法“价值无涉”,只是这种价值取向失去了人的控制,而成为“黑箱”^[24],对教师建立协同育人伙伴关系的价值目标构成了威胁。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偏执加深了人对技术的依赖,抑制了教师协商意愿和深度协作,从而难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同。人对技术工具的依赖关系将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阻碍着教师协同育人伙伴关系的建立与巩固。过于依赖技术可能导致工具性压倒价值性,工具理性的持续扩张可能会造成效率追求对价值关怀的“挤出效应”,也增加了教师沦为工具“奴隶”的风险。

3. 技术逻辑背离协同育人的预设轨道

“技术效率论”的功利性背离建立协同育人伙伴关系的初衷。数智技术革新的全面技术普惠推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展现出技术巨大的功用价值,但技术伦理规制面临严重的价值困境又远远超出了预期。技术创新在功利目的支配下预设了理论前提,而忽视人的超越性追求和人的主体性跃升。这种“技术效率论”的预设,先天地将技术与运用导向了对利润与物欲的追求,而截断了技术驱动下拾级而上的精神需求的发展势头。不可否认,技术在教师协同育人的某些环节具有巨大优势,但在教育育人目标实现上,一味追求技术功利目的所引发的弊端便无可遁形了,因为协同育人的根本在于育人的质量而不是效率。

“技术神话论”的盲目性背离教师协同育人的初心。虽然数智技术可以取代教师的机械劳动,避免教师因时间精力不足而只能依靠经验作出大致推断的偏差,但这种借助于技术而获得的红利催生出人们试图用技术手段去解决所有教育问题的投机念头,并以数智技术的“超人类框架”^[25]捏造“技术神话”,误导人们对“技术神话”的盲目追求。这就会使我们忽略这一概念背后现实条件的匮乏,而无法意识到其背后的问题与逻辑陷阱,甚至导致“技术红利”变为“技术鸿沟”。

五、数智赋能构建协同育人伙伴关系的优化进路

1. 顶层设计:构建数智化教师协同育人机制

一是提供制度保障,推动数智化教师协同育人机制的构建。数智化教师协同育人机制是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的载体。在课程思政理念指导下,将数智技术嵌入教师协同育人,建立起不同课程教师的“强连接”,推动数智化教师协同机制形成和运行,需要从国家战略高度进行系统规划和整体布局,提供切实的制度保障并不断优化制度供给。具体而言,就是要完善教师交互式协商规范、教师数智技术应用规则、教师间协作活动准则等方面的规章制度,以政策引领数智化教师协同机制运行;就是要在科学构建协同体系、形成

完善的协同工作方案、建立良性运行的协作机制和组建得力的工作团队上下功夫,实现制度化运行与管理,保障数智化教师协同机制的有效实施。

二是设立目标体系,促进教师协同育人目标的实现。教育与技术的交错铺就了教育技术融合的轨道。沿着教育与技术的融合式发展道路,设置教师协同育人的目标,形成连贯完整、逐层具体的目标体系,指引数智化教师协同机制的运行方向。目标体系应包括:指向教师对数智技术形成科学认识、掌握应用技能的技术性目标;指向教师协同挖掘思政元素、优化课程内容的教育性目标,包括教师应具备的育人意识、家国情怀、理想追求;指向教师观察行为、实践自觉的实践性目标,涉及对立德树人理念的理解、反思与践行的主体自觉。

三是规范数智空间,形成良好的教师协同育人生态。在制定规范化的数智空间行为准则上,要坚持实现包容和谐、共同参与、以人为本,使数智化教师协同机制运行拥有良好的环境保障。在数智网络空间治理上,进行矛盾调处、事件处置、风险研判、应急管理和监管执法的综合施策,优化数智化教师协同空间环境,推进正能量强劲、主旋律高昂的教师协同空间建设,形成良好的教师协同育人生态。

2. 配套服务:给予技术、经济和情感支持

一是给予技术支持,推进协同平台落成。在数智技术和传播媒介深度融合背景下,推动多模态分析技术和5G、IPv6、XR等技术交叠融合,应用于布局数智协同平台建设,实现群智网络协同创新,为教师协同育人提供技术保障。具体来说,就是在数智赋能教师协同育人过程中,使教师通过“网络平台+移动终端”与其他教师开展持续的、动态的、一体化的协同合作。同时,利用数智技术对教师的课程内容进行智能化再加工,创新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的融合形式,助力教师改变原有课程思政设计方案的单一形式,创新发展出具有新内容、新形式、新特色的育人方案。

二是给予经济支持,拉动技术与教育创新融合。资金支持是实现数智赋能教师协同育人的基础保障。因为无论是数智技术的开发与运用,还是协同平台的建设、运转、综合治理和管理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作支撑,适应数据更新、互动畅通、资源获取的需要,并不断提升服务管理、空间治理和协同监管的能力。另外,在教师的数智素养与技能培训上也要加大经费投入力度,为教师树立数智思维、提高数智技术应用能力保驾护航,将经济投入转化为教育效益。

三是给予情感支持,进行人性化的管理与考评。在技术环境中,数字媒介成为文化现场,“媒介界面成为统合人们多重感觉系统的重要载体,更是具身认知和情感生成的认识论基础”^[26]。在数智赋能下组织管理教师协同育人,需要树立服务意识、加强情感投入,以同频共情代替严格的考核评价,注重教师的情感需要,营造轻松自主的协同育人氛围,推进教师互动“破冰”。这在提升教师胜任力方面有“硬指标”所

无法比拟的“软实力”。

3. 实践执行:推进协同机制落地生效

一是培植教师协同精神,激发实践自觉。所谓协同精神,就是坚持“同向同行”的协同理念、树立“互利共享”的合作思维、增强“共同担当”的责任意识、明确“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教师只有坚定协同精神,才能激发出协同智慧,凝结形成“协同力”。教师改变原有认知和行动框架,将协同精神转变成为自觉实践,通过平等协商实现价值认同、共享育人资源促成协作交互、群策群力发挥协同效应。

二是提升教师数智素养,规避技术陷阱。推进数智赋能教师协同育人伙伴关系构建,就必须引导教师树立数智思维、增强数智意识以提升教师的数智素养。数智思维是在数智空间环境中催生出的利用数智技术有效解决问题和进行创新创造的思维模式。数智意识是对数智技术的优势辅助作用的认同和对其工具局限性有清晰的认知。各课程教师只有自觉树立数智思维、增强数智意识,才能不断提升运用技术参与教师协同的执行力,推动从技术应用向能力素质拓展。同时,教师数字素养的提高可以防止教师过分依赖技术,自觉摒弃和逆转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27],避免变成技术的附庸。

三是注重教师实践反馈,不断优化完善。目标的达成有赖于协同流程的整体推进与不断优化。在目标与任务指引下,经过实践→反馈→调整→实践……的多次改进优化,才能推进教师协同育人伙伴关系走稳走实。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这是“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28]。其中,反馈在实践发展中具有重要的转折作用。推进数智化教师协同育人机制的实践落实,促使教师全身心参与到协同育人的各个环节,就要重视教师反馈并给予积极回应,在教师实践反馈中发现问题,不断优化调整以解决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领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础 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N]. 人民日报,2018-11-01(1).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 人民日报,2022-10-26(1).
- [3][16]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2024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的主旨演讲:携手推动数字教育应用、共享与创新[EB/OL]. (2024-02-01)[2024-11-20]. 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176/202402/t20240201_1113761.html.
- [4] 张志华,孙嘉宝,季凯.“变”与“不变”:高等教育数智化转型的趋向、风险与路径[J]. 高校教育管理,2022(6):23-31+58.

- [5]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2016-12-09(1).
- [6][13] 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强调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 人民日报,2019-03-19(1).
- [7][14]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EB/OL]. (2020-06-06)[2024-11-20].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6/06/content_5517606.htm.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0.
- [9] 徐秦法,梁轩铭. 同向·同行·同构:“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新探索[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4(4):134-141.
- [10] 习近平. 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28日)[N]. 人民日报,2018-05-29(2).
- [11] 王英龙,曹茂永. 课程思政:我们这样设计[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13.
- [12] 蒲清平,何丽玲. 高校课程思政改革的趋势、堵点、痛点、难点与应对策略[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105-114.
- [15] 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通知[EB/OL]. (2018-04-25)[2024-09-26].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804/t20180425_334188.html.
- [17] 尼古拉·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M]. 胡泳,范海燕,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228.
- [18] LUCIANO FLORIDI. The Ethics of Information[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53-69.
- [19] 亚当·奥尔特. 欲罢不能:刷屏时代如何摆脱行为上瘾[M]. 阎佳,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10.
-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1.
- [21] 舒远招. 马克思的创造概念[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5):38-42.
- [22] 张宏.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教育技术发展的现实思考[J]. 教育研究,2016(11):28-32+53.
- [23] 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刘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27.
- [24] 靖东阁.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学知识生产的转型、危机与重构[J]. 教育研究与实验,2022(2):33-39.
- [25] 克里斯·达菲. AI到来[M]. 孙超,译.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1:101-109.
- [26] 曾一果,王敏芝. 数字媒介时代的“情感结构”问题审思[J]. 探索与争鸣,2024(1):165-176+180.
- [27] 保罗·莱文森. 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M]. 何道宽,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87.
-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9.

Empowerment by Digital Intelligence: Partnership Construction in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llaboration Education

LU Han-xu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o achieve the same direction and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general curriculum cours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Intelligent digital technology serve as a bridge facilitat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ers,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al partnerships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ers to achieve synergistic effects. The empowerment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provides dynamic support in eliminating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barriers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resolving the negotiation deficit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nd solving the development problems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reover, it demonstrates unique advantages in reconstructing the educational ecology of curriculum ideology, reorganizing high-quality resources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reshaping the collaborative patter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However,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lso faces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the masking of subject innovation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space, the dominat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over value rationality, and the deviation of technological logic from collaborative expectations. In the face of the reality of both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in building a partnership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efforts need to be made from three aspects: top-level national design, supporting services in schools, and specific practices of teachers,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close collaborative partnership among teachers.

Key words: digital intelligence empowerment;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partnership